

致 读 者

本书不是一部完整的哲学史。它是通过围绕某些主要人物展示思辨哲学来龙去脉的方式赋予知识以人情味的一种尝试。某些次要人物被省略了，目的在于使入选的人物能在所需的篇幅内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因此，对苏格拉底之前的那些半传奇式的人物，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经院哲学家以及认识论学者，本书都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笔者认为认识论诱拐了现代哲学，而且几乎使之毁于一旦。他希冀着有朝一日对认识过程的探讨将被当作心理科学研究的课题，哲学将再次成为对所有经验的综合阐释，而不再是对经验本身的模式和过程所做的分析描述。分析属于科学，它给予我们知识；哲学则必须提供对智慧的综合。

笔者想在此向奥尔登·弗里曼 (Alden Freeman) 表示衷心的感谢。他给予笔者的教诲、提供的游历机会以及对笔者欲过一种高尚、开明生活的鼓舞，笔者是终生都难以报答的。但愿这位挚友在这些篇幅内——虽然无足轻重且不能尽如人意——的发现与他的慷慨和信任并非十分不相称。

威尔·杜兰特

引 言

论哲学的用途

哲学里大有可资读书人品尝玩味的乐趣，甚至就连形而上学的虚无飘渺也自有其动人之处，不幸我们都是肉身凡胎，七情六欲一下子就使我们从思想的高空堕入为了生计而锱铢必较的市场中来了。很多人都知道，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黄金时代，当时哲学正如柏拉图所说，是“那种难得的快乐”。对羞于露面的真理的热爱似乎超过了对肉体享受和世俗财富的追求。上古对智慧这种无可比拟的崇拜时至今日仍然残留在我们渴望的灵魂中。“生活富于意义”我们和布朗宁 怀有同样的感慨——“去发现这种意义就是我的美酒佳肴”。我们的一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毫无意义的琐事中，磨磨蹭蹭的踌躇中和碌碌无为的哀叹中磋 掉的。我们徒劳地与外界的纷扰和内心的迷惘抗争着，然而，我们一刻也没有丧失这样的信念，即只要我们能够洞悉自己的灵魂，我们就会找到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那根精神支柱。我们想了解一切，“对我们来说，生活就意味着不断地把我们的全部人格或经历变成光和烈焰”。② 我们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米蒂娅——“一个不贪图万贯家财，而只想为自己的问题找到一个答案的人”一样。

① Robert Browning (1812—1889) ，英国著名诗人 ——译注。
尼采：《快乐的智慧》序。

世事无常，纷纭变幻，我们只有从整体上把握住它们的意义，才能从日常生活的漩涡中挣脱出来。我们应该在有生之年一是一、二是二地弄清生活的本来面目，并用“永恒的眼光”去识别那些似乎具有永久价值的事物。我们应该学会在命运面前昂首大笑，甚至在死神降临之际也能处之泰然。我们应该成为完整的人，应该整饬调和我们的种种欲望，以此来协调我们的精力。因为经过协调的活力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终极目标，或许也是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终极目标。“要成为哲学家”梭罗说过：“并不是只要有深邃的思想，甚至也不是去建立一所学校就行了，而是要热爱智慧，并愿意按照它的吩咐去过一种艰苦朴素、自食其力、宽宏大量和充满信心的生活”。我们可以肯定，只要我们能找到智慧，其他一切都会不期而至。“先去寻找心灵的宝藏”，培根告诫我们说，“其余的要么应有尽有，要么失去了也无关痛痒”。真理不会使我们发财，却会使我们自由。

有些读者会在这里不客气地插进来奉告我们说，哲学毫无用处一如国际象棋，晦涩艰深近乎愚昧无知，停滞不前恰似自满自足。“再也没有什么”西塞罗说过：“比在哲学家的书本里找到的更为荒谬了”。诚然，有些哲学家学富五车，但却缺乏常识；而且许多高高在上的哲学家也是凭借空气的浮力才飞上青天的。不过，在我们这次航行中，让我们绕开形而上学的浊流和神学争端那“众多喧嚣的海域”，而只在光明之港停泊吧。然而哲学真地停滞不前吗？科学似乎总是在乘胜前进，而哲学则似乎总是在节节败退。不过这只是因为需要哲学解决的问题都是尚无科学方法可资借助的问题——诸如善与恶、美与丑、生与死、秩序与自由等等，而这是一项艰巨、冒险的任务。每当一个研究领域产生了可以用精确的公式来表示的知识时，它就进入了科学的行列。每一门科学都是以哲学开始，以艺术告终的。它起源于假设，而结束于累累的硕果。哲学是对未知事物（如在形而上学中）和所知

确切的事物（如在伦理学或政治哲学中）所做的假设解释，它是真理攻坚战的前哨阵地。科学是被占领的领土，在它的背后，是那些安全地带。在那里，知识与艺术建立了我们这个并不完美的奇异世界。哲学之所以看起来迷惘彷徨、驻足不前，是因为她总是把胜利的果实留给自己的女儿——科学，自己却永不满足地踏上探索未知领域的征程。

是不是让我们的学术气再浓一些？科学是分析描述，哲学是综合阐释。科学要把整体化为局部，有机体分成器官，晦涩变得易懂。它不去调查事物的价值和理想的可能性，也不去考察它们的终极意义，而只满足于说明它们的现状和作用，只把眼光紧紧盯在事物本身的性质和过程上。科学家就像屠格涅夫诗中的大自然一样不偏不倚：他对一只跳蚤的腿跟对一个天才创作时的痛苦同样感兴趣。然而，哲学家却不满足于对事实的描述，他希望弄清楚它与一般经验的关系，从而把握住它的意义和价值。他把事物集中起来，进行综合说明；他要把被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科学家出于分析目的像拆卸手表似地拆开的宇宙再重新拼合起来，而且要拼得比以前的更好。科学教会我们怎样救命，怎样杀人；它一点一滴地降低了死亡率，然后又在战争中把我们一下子统统消灭。唯有智慧——借助全部经验协调过的愿望——才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救死扶伤，什么时候需要大开杀戒。观察过程，构造手段是科学；批评和协调目的是哲学：正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段和工具在成倍地增长，远远超过了我们对理想与目的的阐释和综合，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又什么意义也没有。因为一事实若不和愿望发生关系便一钱不值，除非与目的和整体发生关系，否则，光是事实还不完备。光有科学而无哲学，光有事实而无洞察力和价值观，是不能使我们免于浩劫和绝望的。科学给予我们知识，然而只有哲学才给予我们智慧。

具体说来，哲学意味着并包括了五个研究领域和论述范围：逻辑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逻辑学是对思维及其理想方法的研究：观察与内省，演绎与归纳，假设与实验，分析与综合——这些都是逻辑学试图理解和指导的人类活动的形式。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门学问沉闷乏味，然而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无不是人们在自己的思维与研究方法上所做的改进。美学是对理想形态，抑或美的研究；它是艺术的哲学。伦理学是对理想行为的研究；至高无上的知识，苏格拉底说，就是善恶的知识，人生智慧的知识。政治学是对理想社会组织的研究（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谋取一官半职的艺术和科学）；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这些都是政治哲学中的剧中人。最后，形而上学（招来了这么多非议，因为与其他哲学不同的是，它不是借理想来协调现实的尝试）是对天地万物的“终极存在”的研究，是对“物质”真实的、最终木质的研究（本体论）是对“精神”的研究（哲学心理学），并且是对“精神”与“物质”在感知和认识过程中相互关系的研究（认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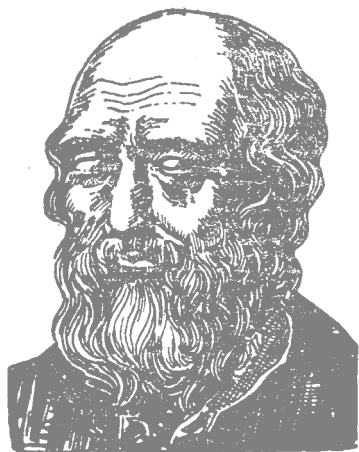
这些就是哲学的组成部分，然而一把它们拆得七零八落，哲学的美和乐趣就荡然无存了。因此，我们不打算在干巴巴的抽象概念和对形式的拘泥中，而是在天才的血肉之躯中寻找先哲的思想。我们不仅仅要研究哲学，而且还要了解哲学家。我们要让这些思想的圣人和殉道者们陪伴着我们度过一生，让他们光彩照人的精神时时沐浴着我们，直到我们也能领略到些许达·芬奇所谓“最高尚的乐趣、理解的欢愉”为止。如果我们的学习方法得当，我们会发现，这些哲学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你

①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巨人——译注。

知道”，爱默生问道，“学习的诀窍吗？每个人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因此我是他们的小学生”。我们拿这种态度来对待历史上的思想巨人，肯定是不会有伤自尊心的！此外，我们还会为爱默生的另一句话感到沾沾自喜，这就是当我们倾听天才的讲话时，我们会鬼使神差地回忆起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朦朦胧胧地也产生过跟天才一模一样的思想，只是当时我们没有口才或勇气把它们用形式和语言表达出来罢了。的确，只有当我们具备聆听他们的耳朵和灵魂的时候，只有当我们心中至少埋有那在他们身上开花结果的根系的时候，伟人才向我们讲话。我们也有过他们的经历，然而却没能从那些经历中吸吮出它们的奥秘和精微意义：我们对周围现实中嗡嗡作响的各种泛音不够敏感。天才听见了这些泛音和来自上天的音乐；天才知道毕达格拉斯称哲学为最高的音乐是什么意思。

因此，让我们倾听这些人的呼唤，乐于原谅他们偶尔的谬见，并热切地去掌握他们如此热切地给予我们的教诲吧。“然后我们还要通情达理”，老苏格拉底对克里同说，“不要管那些哲学教师是好是坏，一心一意地去考虑哲学本身吧。认认真真的把它审视一番，如果它天性邪恶，那就让所有的人都远远地离开它；但是如果它没有辜负我对它的信任，那就追随它、侍奉它，并且尽情地欢笑吧”。

- ① Ralph Waldo Emerson (1830—1882)，美国十九世纪超验主义文学运动领袖，后世的一些思想家如尼采和柏格森都公开承认从他那里受益匪浅——译注。
- ② Crito，（约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人），雅典富翁，因钦慕苏格拉底的智慧而成为其忠实门徒——译注。



第 一 章

柏 拉 图

一、柏拉图时代的前前后后

仔细观察一下欧洲地图，你就会注意到希腊是一只把弯曲的指头伸进地中海的瘦骨嶙峋的手。在它的南面，是居群岛之冠的克里特，从那里伸出的手指，于公元前两千年抓住了文明与文化的源头。往东，与希腊隔爱琴海相望的小亚细亚，虽然现在自甘寂寞、与世无争，但在柏拉图时代之前却是工业、商业和投机事业极其活跃的地区。往西，在爱奥尼亚海的彼岸，意大利像一尊斜塔矗立在万顷波涛之中，而西西里和西班牙当时则遍布着蒸蒸日上的希腊殖民地。在顶端，是“海格立斯界柱”（我们称之为直布罗陀），古代还没有多少水手敢于穿越这座阴沉沉的大门。北面是那些尚未开化、仍处于半野蛮状态的地区，当时叫塞萨利、伊皮鲁斯和马其顿；来自或假道这些地区而来的剽悍部族在希腊定居下来，蕃衍将息，随之才有了荷马和伯里克利时代的天才们。

再观察一遍地图，你会看到参差不齐的海岸线和起伏不平的地势；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海湾和滚滚波涛；整个陆地都为群山和丘陵所覆盖。希腊便被这些海洋和陆地的天然屏障弄得支离破碎，与世隔绝；当时的旅行和交通远比现在困难危险得多，因此每个峡谷都有自己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自己独立自主的政府，自己的机构、方言、宗教和文化。它们都是由一两座城市和周围蜿蜒隐没在山坡上的农业社会组成的：这就是埃维厄岛、洛克里、埃托利亚、福基斯、维奥蒂亚、阿黑亚、阿戈利斯、伊利斯、阿卡迪亚、美塞尼亚、拉科尼亚——及其斯巴达，和阿蒂卡——及其雅典的“城邦国家”。

最后再审视一遍地图，并观察一下雅典的位置：在所有希腊的大城市中，它坐落在最东面。这种地理位置使它有幸成为通向东方的门户，希腊人可以从这里流入小亚细亚繁忙的城市，而那些资格更老的城市则可以假道这里把它们的奢侈品和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年轻的希腊。坐落在这里的天然良港，比雷埃夫斯，更为数不清的大小船舶提供了一个躲避狂风恶浪的停泊之处。此外，这里还集结着一支气魄宏伟的舰队。

公元前 490 至 470 年，斯巴达和雅典消释前嫌，合兵一处，挫败了大流士和薛西斯统帅下的波斯人变希腊为亚细亚帝国殖民地的企图。在这场年轻的欧洲对昏聩的东方的斗争中，斯巴达提供了陆军，雅典则出动了海军。战争一结束，斯巴达人便解甲归田，并且深受这一过程必然给他们的经济带来的种种危害；而雅典的海军摇身一变，成了商业船队，一举进入古代世界最大的贸易城市之列。斯巴达故态复萌，重新回到农业社会闭关自守、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去，而雅典则成了一个繁忙的商业中心和进出口岸，成了众多民族交融与各种迷信、习俗汇集的地方。有了这种广泛的联系和竞争，就有了比较、分析和思考。

各种传统和教条在这样五花八门的交往中心很快就相互抵消

了。当同时存在着一种信仰的时候，我们往往对它们统统不以为然。那时的商人也许是第一批怀疑论者，他们见得太多了，因而对一切都不轻易相信。而商人那种把所有人都划分为傻瓜和无赖的禀性使他们对各种思想和主义一概持怀疑态度。渐渐地，科学也跟着发展起来了；数学随着交换的日益复杂化在不断成熟，天文学则随着海上日益大胆的冒险而臻于完善。财富的增长带来了闲暇和保障，而这正是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的先决条件。现在人们有求于星辰日月不单单是为了指导自己在海上的航行，而且也是为了给自己寻找宇宙之谜的答案；第一批希腊哲学家便是天文学家。“人们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亚里士多德说：“他们在波斯战争之后继续向前推进，把所有知识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并且寻求日益广泛的研究对象”。他们变得越来越有胆识，在把各种过程和事件归结为超自然力的作用之前，他们总要尝试一番合乎自然规律的解释。魔鬼与宗教仪式逐渐让位于科学和控制。哲学随之诞生了。

起初，这种哲学只注重物质：它把注意力放在外部的物质世界上，并且不断地探问事物最终的、不能再小的组成部分是什么。这一思维方式在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370年）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述——“实际上除了原子和虚空之外别无他物”。这是希腊哲学思想的主流之一，在柏拉图时代，它一度潜入地下，但是在伊壁鸠鲁那里又复出现，并在卢克莱修那里变成一股雄辩的洪流。然而，古希腊哲学发展中蕴含丰厚、独树一帜的哲学流派却滥觞于智者派。他们是四处漂泊游历，以启迪人们的智慧为己任的教师。他们都很机智（如高尔吉亚和希庇亚斯），其中不少人还很深刻（如普罗泰戈拉斯和普拉迪克斯）。当代精神与处世哲学中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或解答他们没有意识到、讨论过。他们对一切都提出质询，就是在宗教或者政治禁忌面前也毫不畏惧，并且大胆地传唤所有的信条和机构统统出庭，接受理

的审判。他们在政治上分为两派。一派像卢梭那样争辩说自然是善，文明是恶；人天生平等，只是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里才变得不平等了；法律是强者用来束缚和统治弱者的发明。另一派则同尼采如出一辙，他们声称自然是超然于善恶之外的，人天生不平等，道德是弱者用以限制与阻碍强者的手段；强权是至高无上的德性，也是人类最高的愿望；而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最明智、最合乎自然的的就是贵族制。

无疑，对民主制的这种攻击，反映了雅典城内少数有产阶级的兴起，他们自称“寡头党”并谴责民主制软弱无能，形同虚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并没有多少民主制好谴责，因为在雅典的四十万居民中，二十五万人是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可言；在十五万自由民或公民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出席讨论决定国家方针政策的公民大会。不过，就他们所拥有的那一点点民主而言，其彻底的程度却是空前绝后的。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而最高司法机关，迪卡斯特里法院，由一千名成员组成（以减少受贿机会），是按照字母顺序从所有公民的花名册上挑选出来的。没有什么机构能够比这更民主，抑或，如同它的反对者所说，更荒诞不经了。

在长达三十年的伯罗奔尼撒大战中（公元前430—400年），斯巴达的陆军与雅典的海军展开激战，最终大获全胜。这时，寡头党在克利蒂阿斯的策动下，以民主派在战争中指挥失利为由提出废除民主制的主张，并在暗中大肆吹捧斯巴达的贵族政府。为此，许多寡头党领导人遭到了放逐，然而当雅典最终宣布投降时，斯巴达强加的媾和条件之一就是把遭受流放的贵族重新招回雅典。以克利蒂阿斯为首的这批人一回城，就宣布对在那场灾难性的战争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民主”党进行一次富人的革命。这场革命失败了，而克利蒂阿斯也战死沙场。

这位克利蒂阿斯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叔父。

二、苏格拉底

如果我们可以从那尊半身雕像——这是作为古代雕塑遗迹的一部分流传给我们的——来判断的话，苏格拉底即便作为一位哲学家，也远远谈不上英俊潇洒。秃顶，大圆脸，深陷的眼眶里目光凝滞，宽阔的酒糟鼻子乃众多酒宴的生动写照——单从这副尊容来看，谁都想不到这就是最负盛名的哲学家，反倒会把他当成跑堂的。然而，一仔细观察，我们就会透过这块粗糙的石头，发现其为人厚道、朴实无华的蛛丝马迹，正是这些品质使得这位其貌不扬的思想家成为深受雅典优秀青年爱戴的良师益友。我们对他所知甚少，然而比起贵族老爷柏拉图或者沉默寡言、一副学者派头的亚里士多德来，我们对他却更为熟悉，也更为了解。两千三百年过后的今天，我们仍能看到他那笨拙的身影裹在常年不换、皱皱巴巴的及膝短袍里，优哉悠哉地穿过广场，对动荡不安的时局充耳不闻，只是逢人便侃侃而谈，就这样把年轻人和有识之士聚拢在自己的周围，然后率领他们来到神殿门廊的荫凉处，叫他们在争论之前先对自己的用词加以限定和说明。

聚集在他身边的这伙人中，三教九流，应有尽有，然而正是这些青年帮助他创造了欧洲哲学。他们之中有像柏拉图和亚西比德那样的阔少，这些人喜欢津津有味地听他对雅典民主制所做的冷嘲热讽的分析；有像安提西尼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喜欢老师的清贫和淡泊，并以此作为自己效法的楷模；甚至还有两三个像亚里斯卜提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混迹其中，他们憧憬着一个没有主仆之分，大家都能像苏格拉底一样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世界。所有使当今社会感到焦灼不安，并为青年人没完没了的辩论提供了话题和谈资的问题，当时同样激动过这一伙思想家和清谈者。和自己的老师一样，他们都认为生活中若是没有了畅谈，

自己便枉为人一世了。每一种社会思潮在这里都有其代表人物，或许还有其渊源。

至于这位先哲是怎样生活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他一不干活，二不考虑第二天的生计；弟子们请他光临自己的餐桌时，他就大吃一顿，而他们一定也很喜欢有他作陪，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他是养生有道的。他在家就不那么受欢迎了，因为他对妻子儿女不管不顾；而从桑蒂普的观点来看，他是个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没有给家里带来多少面包，倒招来不少是非。桑蒂普差不多和苏格拉底一样是个话匣子，而他们似乎也有过一些柏拉图未能记录下来的对话。不过，她还是爱他的，就连看到他在古稀之年死去，仍不免肝肠寸断。

他的学生为什么这样崇敬他呢？也许因为他不仅是个哲学家，而且还是个男子汉的缘故吧。他曾冒着很大的风险在战场上救过亚西比德的命；他饮酒时像个绅士——既不害怕，又不过度。然而他们最喜欢他的还是他虽然充满智慧，但却十分谦虚的品格。他从不夸口自己多有智慧，而是满怀热忱地追求智慧。他是智慧的业余爱好者，而不是它的专业工作者。据说德尔斐的神谕独具慧眼，宣布他是最有智慧的希腊人，而他却把这件事解释成对不可知论的赞同，那是他哲学的起点——“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当一个人学会怀疑，尤其是怀疑自己珍视的信念、教义和原则的时候，哲学就出现了。谁知道这些珍视的信念是怎么在我们这里变得如此确定无疑的呢？谁知道这一定不是某种心愿在从中作梗，为愿望披上思想的外衣而引起的呢？只有当心灵转过身来，直面自己，审视自己的时候，真正的哲学才会出现。Gnothi seauton，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

当然，在他之前，也有过哲学家：坚强有力者如泰勒斯和赫

① Xanthippe，苏格拉底的妻子，传说是个悍妇——译注。

拉克利特；探幽抉微者如巴门尼德和埃莱阿的芝诺；远见卓识者如毕达格拉斯和恩培多克勒。然而，他们大多是自然哲学家。他们寻找的是本源，抑或外界事物的本质，物质与客观世界的原理和要素。那固然很好，苏格拉底说，但是对于哲学家来说，还有一个远比所有这些树木和石头，甚至所有那些星辰更有价值的课题，那就是人的心灵。人是什么？他能成为什么？

于是他着手窥探起人类的灵魂来了，一会儿对这个假定进行商榷，一会儿又对那件确定无疑的事情提出质询。如果有人不假思索，口若悬河地大谈正义，他就会平静地问道，*tò tí?*——它是什么？你用来如此轻易地解决生死问题的那些抽象字眼是什么意思？你说你自己是什么意思？苏格拉底就喜欢琢磨这些道德和心理问题。一些在这种“苏格拉底问答法”——一种要求定义准确、思路清晰、分析精当的方法——面前栽过跟头的人反对说，他的问题多，答案少，只能使人们的思想比以前更混乱。不过，他为哲学留下了两个十分明确的答案，从而解决了两个最困难的问题——善是什么意思？最好的国家是什么？

对当时那一代雅典青年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些问题更举足轻重了。智者派摧毁了这些年轻人对奥林匹斯诸神和当时道德法规的信念，而这种道德法规的约束力主要来自人们对那些无所不在的众多神像的畏惧。显然，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人们可以为所欲为，这已经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了。这种涣散人心的个人主义削弱了雅典人的性格，终于使雅典沦为生性严厉的斯巴达人的囊中之物。至于国家，还有什么比这种在感情冲动的暴民控制下的民主制，这种在辩论会领导下的政府，这种对将军们随随便便地升迁、罢免和处决，这种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按照字母顺序把头脑简单的农夫和手艺人选进国家最高法院的做法更令人啼笑皆非的呢？一种新的、合乎自然的道德怎么能在雅典培养起来呢？国家怎么能得到拯救呢？

正是对这些问题 的回答把苏格拉底推上了死路，也给他带来了不朽 的声名。如果他努力去恢复人们对古老的多神教的信仰，把他那帮思想解放的年轻人带到神殿和神圣的树林子里去，并叫他们重新祭祀父辈们的神祇，那他是能够获得公民中长者们的拥戴的。但是他觉得这无异于一种毫无希望的自杀政策，一种历史的倒退，只能把人引进而不是“越过坟墓”。他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只相信一个神，并且以自己虚怀若谷的方式希望死亡不会把他完全摧毁。不过，他知道一种持之久远的道德法规是不能建立在这样含糊不定的神学之上的。如果一个人能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宗教教义、对无神论者和对虔信的人同样有效的道德体系，那么无论什么神学的兴衰都不会松动变任性的个人为和平的公民的道德纽结了。

如果，比方说，善意味着聪颖，德意味着智慧；如果人们经过教育，能够看清自己的利益，预见到行为的后果，自己的欲望也能从徒劳无益的浑浑噩噩之中整伤和协调成为自觉的和谐，这或许就能成为受过教育、洞明世事的人的道德。而在没有文化的人那里，道德就要依赖不停的告诫和外部的约束了。也许全部罪恶就是错误、偏见和愚蠢？聪颖的人会和愚昧的人同样具有猛烈的、反社会的冲动，不过他们肯定能更好地控制住自己，不会动辄就像野兽那样凶残毕露。在一个治理有方的社会里——一个在更大的权力范围内给予个人的超过在有限的自由内向他索取的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利益就在于他的社会行为和忠实品格，而要保障和平、秩序和友善，只需要具备开阔的视野就够了。

然而，如果政府本身就充满了混乱和荒谬，如果它统治而不帮助，命令而不领导，在这样的国家里，我们怎么能够说服个人去遵纪守法，并使一己的私利服从整体的利益呢？难怪亚西比德要起而反抗不相信能力、崇尚数量胜于推崇知识的国家。难怪没有思想的地方便会出现混乱，而乌合之众在仓促和无知中作出决

定，却要在凄凉中为此后悔不已。数量就能产生智慧，这难道不是十足的迷信吗？相反，一个随处可见的事实不正说明人们一聚在一起就比分散和独处时变得更愚蠢、更暴烈，也更残忍吗？人们竟会受到“摇唇鼓舌、喋喋不休，像被人敲了一下响个不停的铜壶”似的演说家们的摆布，难道不感到羞耻吗？无疑，对一个国家的治理需要人们贡献出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需要出类拔萃的思想家们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除非由最有智慧的人来领导，否则一个社会怎么能有救，或者变得强盛起来呢？

设想一下，正当战争需要对所有的批评意见进行压制的时候，而少数有文化的富人正在酝酿一场革命的时候，雅典的大众党对这种贵族的言论会是什么反应吧。再想一想安奴托斯的心情吧，这位民主派领导人的儿子成了苏格拉底的弟子，先是攻击父辈的神祇，后来便当面嘲笑起他的父亲来了。这种反社会的才智貌似公正地取代了旧道德所引起的结果，阿里斯托芬不是分毫不爽地预料到了吗？

革命到来了，人们踊跃参加，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两派人马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当民主派取得胜利时，苏格拉底的命运便决定了：不管他本人多么温和，他是造反派的思想领袖、令人痛恨的贵族哲学的根源、腐蚀只知道沉醉于辩论之中的青年的教唆犯。苏格拉底应该死去，安奴托斯和米利托斯说，这样会好些。

剩下的故事便众所周知了，因为柏拉图用比诗歌还要优美的散文为我们记录了下来。我们能够有幸拜读这一质朴和勇敢的（如果不是传奇式的）“辩解”，在这篇辩护辞中，哲学的第一位殉道者宣布了自由思想的权力和必要性，确认了自己对国家的价值，并且拒不愿向他素来不屑一顾的人群乞求怜悯。他们握有赦免他的权力；他却不屑提出上诉。法官们要释放他，而愤怒的人群则投票要求处死他，这恰恰别具一格地证实了他的理论。他不是

把众神都摒弃了吗？那就让这位教得太快，叫人跟不上的老先生尝尝苦头吧。

于是，他们决定让他饮鹤而死。他的朋友们来到牢房，给他带来一条易如反掌的脱身之计。他们已经买通了所有妨碍他获得自由的官吏。但是他拒绝了。现在他已届古稀之年（公元前 339 年）；也许他觉得自己已经没几天活头了，而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死得其所了。“振作起来”，他对陷于悲痛之中的朋友们说，“告诉人们你们掩埋的只是我的尸体”。“当他说完这句话后”，柏拉图在世界文学的伟大篇章之一中这样写道：

他站起身来，叫我们稍候，就和克里同一块儿走进浴室去了。我们一边等候，一边说着话，大家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就像一位我们正在失去的父亲，而我们就要作为孤儿去度过自己的余生了……太阳落山的时刻临近了，他在里面已经呆了很长时间。终于，他出来了，又和我们坐在一起，……大家只是相对无言。很快，狱卒走了进来，站在他的身边，说道：“苏格拉底，在所有来过这里的人当中，您也算最高尚、最温和、最善良的一个了。我每次服从当局的命令，吩咐其他犯人服毒，他们就像发了疯似地把我骂个狗血淋头，您是不会和他们一般见识的。其实我明白您不会生我的气，因为您知道错在他人，不在我。我这就向您告别，死生有命，请您尽量想开点。我这份差事，您是知道的。”说罢，只见他眼泪夺眶而出，转身出去了。

苏格拉底望着他说：“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听您的吩咐。”然后他转过身对我们说：“这个人多可爱呀，这些年来，他没少来看我……看看刚才他向我表示遗憾时是多么慷慨吧。我们必须按照他的吩咐行事，克里同，看看鸡酒准备好了没有，如果准备就绪，就叫人端来。

“可太阳还在山头上呢，”克里同说，“许多人都是一拖再拖，就是宣布叫他们就死之后，他们也要大吃大喝，寻欢作乐一通才肯罢休。您又何必这么忙，还有的是时间哩。”

苏格拉底回答说：“是的，克里同，你说的那些人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们认为通过拖延可以有所得。不过我不这样做，也是对的，因为我不认为晚死一会儿自己就能得到什么。我吝惜和挽救的生命已经奄奄一息了，要是那么做，我只能感到自己可笑。请按照我的话去做吧，不要拒绝我。”

听见这话，克里同朝仆人做了个手势。仆人走进内室，过了一会儿，便和端着一杯毒鸩的狱卒出来了。苏格拉底说：“您，我的好朋友，是有经验的，就请教教我这事儿该怎么进行吧。”狱卒回答说：“您只要来回走动，等到走不动了，再躺下来，那时毒性就发作了。”说着，他把杯子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轻松自如、温文尔雅地接过杯子，毫无惧色地说：“您说我可以把这杯酒来祭奠神灵吗？能还是不能？”狱卒回答说：“我们就准备了这么多，苏格拉底，再也没有了。”我明白了，”他说；“不过我可以而且必须祈求众神保佑我在去另一个世界的旅途中一路平安——但愿我的祈求能得到满足。”说完，他把杯子举到唇边，高高兴兴地将毒鸩一饮而尽。

至此，我们尚能节制自己的悲哀。然而，当我们眼见他一口气把鸩酒喝完时，都禁不住潸然泪下了。我用双手捂住脸，泪水却像泉水般从指缝间涌流出来，我是在为我自己哭泣。因为我确实不是在他而哭泣，而是一想到自己就要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便使我悲‘恸’不已。不独我是这样，克里同也止不住泪如雨下，忙起身躲到一边去了。这时，一直在一旁悄然啜泣的阿波罗多罗斯突然失声痛哭起来，于是大家顿时都失去了勇气。只有苏格拉底泰